



中国经济学名家文集(多卷本)系列

蒋一苇文集

第二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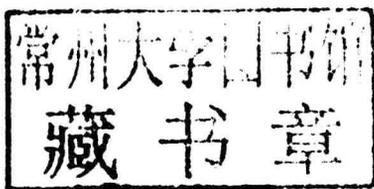
经济管理出版社
ECONOMY &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



中国经济学名家文集(多卷本)系列

蒋一苇文集

第二卷



经济管理出版社

ECONOMY &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蒋一苇文集：全八册 / 蒋一苇著. —北京：经济管理出版社，2013.11
ISBN 978-7-5096-2698-6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经济学—文集 IV. ①F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7660 号

组稿编辑：陈 力

责任编辑：蒋 方 勇 生 张 艳 陈 力

责任印制：杨国强

责任校对：蒋 方

出版发行：经济管理出版社

(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)

网 址：www.E-mp.com.cn

电 话：(010) 51915602
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mm × 1000mm/16

印 张：216.75 (共八卷)

字 数：4160 千字 (共八卷)

版 次：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96-2698-6

定 价：980.00 元 (全书共八卷)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印装错误，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。

联系地址：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

电话：(010) 68022974 邮编：100836



蒋一苇



1959年4月蒋一苇被划为“漏网右派分子”后下放到中国第二砂轮厂(郑州)工作。



1960年困难时期,为了解决职工营养不良状况,蒋一苇在中国第二砂轮厂试制小球藻营养剂。这是他建造的小球藻培养池。



1963年蒋一苇在家中给儿女们布置的学雷锋园地。图中左上方墙上挂着陈然烈士的遗像。



1965年7月蒋一苇(前排右四)和夫人陈曦(前排左三)与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会计班毕业生合影。



1976年8月蒋一苇(二排左五)与石家庄市机械局企业干部培训班师生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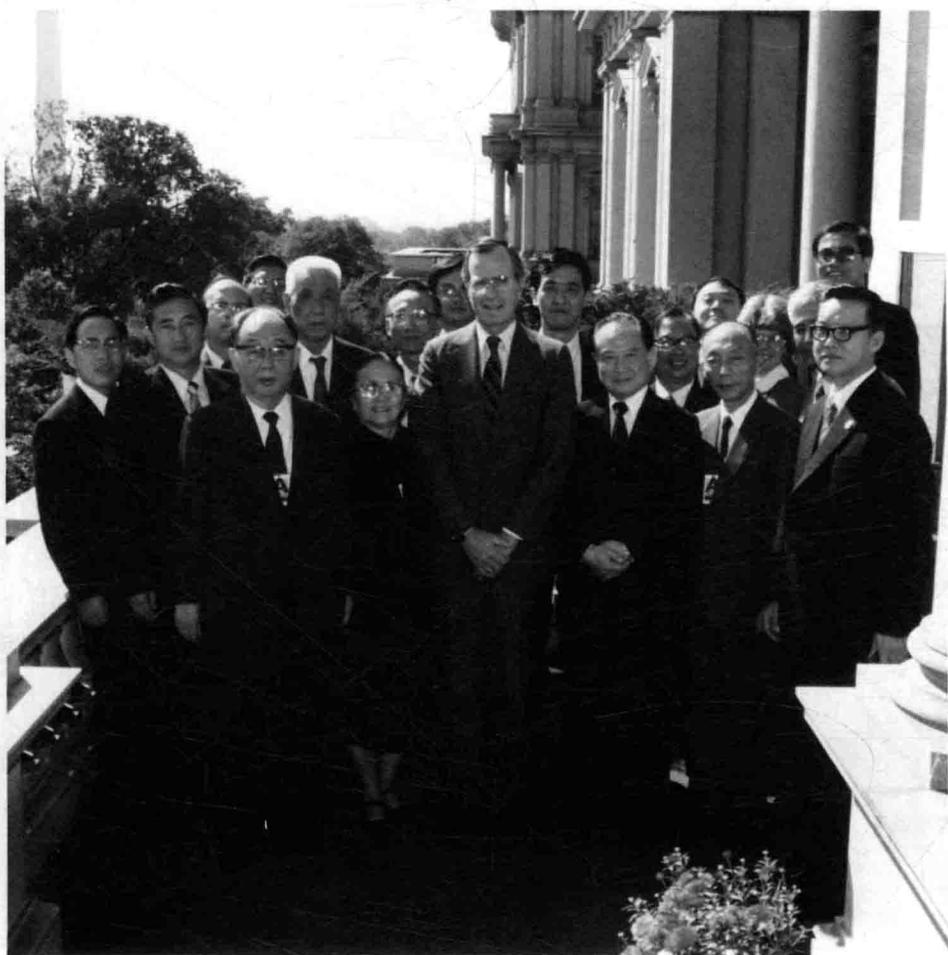
1976年蒋一苇(后排左四)到湖北襄樊参加全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培训会议时的合影。



1978年蒋一苇(三排右四)与于光远(一排左六)等同志在大庆撰写《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》一书时的合影。



1979年蒋一苇(后排左二)与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合影。后排左三为马洪同志。



1979年10月蒋一苇(前排右二)随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访问美国，在华盛顿白宫前合影。前排右三为薛暮桥同志。



1980年10月蒋一苇会见日本产业代表团。图为蒋一苇与日本客人交谈。



1980年11月27日蒋一苇(前排左五)与夫人陈曦(前排左四)参加“11.27”死难烈士牺牲三十一周年纪念会。

科学普及与技术进步

目 录

创刊的话	1
科学建设需要国内和平	3
八卦与新行星	5
谈行星	7
工业化与科学运动	14
摩登封神传	16
牛郎织女的故事	17
伽利略	
——科学真理的殉难者	22
牛顿和苹果	27
论爱迪生	30
科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	41
机械工人基本数学	44
科学普及工作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起着重要的作用	274
技术进步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	278
谈谈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问题	398

创刊的话*

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，20世纪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。

现在已经是20世纪的40年代了。这时候全世界的反侵略战争已告结束，但建设和平与民主的新世界，却还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。

我国提倡科学，已经有一段不太短的历史：从清朝末年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提倡洋枪大炮起，经过“五四运动”直到现在。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虽然也有一些个别的不可抹杀的成就，但以整个国家的成就说来，显然是处于相当落后的地位。

这种落后情形的造成，自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社会的背景；但在我们科学工作者本身上，或由于自身的忽略和错误，或由于环境的限制，以致未能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当然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

“曾、左、李”时代，科学之提出是被限制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原则之下，所谓科学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就只是铁路、洋船、枪炮……而已，被当作走卒和工具来为他们的“中兴运动”而服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科学之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和发展是很显然的。

“五四运动”时代，在“迎接赛先生和德先生”的口号之下，提出了“接受科学”与“发展民主”两大课题，使我国的科学运动发生了广大的启蒙作用，但是历史的逆流阻害了这两大课题的自然成长，整个科学运动被淹没而窒息在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激流之中。

“九一八”之后，民族危机尖锐化，一时“科工救国”以及“航空救国”之类的伟论大为盛行，这些论调似乎已经一反“西学为用”的看法而把赛先生从客位移上主位了，实质上把科学当作走卒看待的态度并无两样。科学仍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和发展也是显然的。这些“科学至上论”只是方便

* 本文发表于《科学与生活》1946年第1期。

了一些人，把当时国势颠危的一切原因，都归萃到“科学不发达”的身上，而把真正造成内忧外患的经济和政治的因素，轻轻地加以粉饰了，并且还成为当时“唯武器论”、“准备论”……一些恐日病论调的根据。

抗战开始，科学运动跟着其他文化都走上一个新的途程，我们看到年轻的工程师、科学工作者，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，创造了许多配合战争需要的事业，他们不但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，而且跟着其他文化工作，走入广大人民之中，起着新的启蒙作用，帮助了生产，也相当地击退了迷信势力的盘踞，然而可遗憾的是在抗战最后阶段和已经获得胜利的今天，我们又重新听到工业危机和农村恐慌的惨痛呼声；在我们周围又充满了瘟神、祈雨、火醮、朝山进香、金钱挂、麻衣相法……

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我们面对着这些事实，是不能不感到羞愧的，我们不能因有社会背景的许多因素存在而诿卸自己的责任。

今天，战争已成为过去，展在我们面前的是比抗战更艰巨万倍的和平建设工作，这工作不能做得好，20年后我们不免又要悲唱：“用我们的‘血肉’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”了。

我们认为要使科学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芽、开花，那么普及民间科学，和使科学与人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工作。科学只有深入民间成为广大人民的所有物，才能够生根滋长，才能够切切实实地造福于人民，从而发挥其对于建设新中国的雄伟力量。

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应该有机地吸取世界科学已有的成果，使之“中国化”，并批判地整理和接受民族固有的遗产，使之“现代化”。

因此我们认为今后的科学运动应该是一个新的科学运动。所谓新的科学运动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科学运动；是与广大人民生活 and 利益相符合的科学运动。

本社同人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些传播科学的工作，希望把科学的种子，借这小小刊物，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我们希望这刊物先成为中学生以及离开学校的自学青年的良好读物，并成为全国科学工作者、科学教师们的公共园地。再经他们的媒介和努力，渐成为广大人民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一个小小补给库。

但是，我们学识简陋，能力有限，这刊物如果能够存在和发展，那是需要广大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、读者们……给我们支援和批评，同时我们更热切地盼望着国内外科学界的先进们，给我们以教正和指导。

科学建设需要国内和平*

自从原子弹出世之后，人类的科学文明是用飞跃的姿态向前进了一大步。像英、苏、法……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，尚且感到落后了四五年；拿中国来说，那简直是又落后了一世纪。

我们现在是被抬上“四强”之一了。但是强在哪一点呢？只要我们还有点理智存在，谁都会对这“荣誉”感到汗颜吧？

就科学的建设而讲，不说“四强之一”当不起，我们连做一个四强以外的普通的现代化国家，恐怕还不够格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应该怎样地拼全国之力来做“迎头赶上”的奋斗啊！

可是抗战胜利欢声还未静止，却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！这一内战在帝国主义操纵之下，如果一直打下去，势必把我们八年来艰苦抗战的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，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位。

我们提倡科学已不少时日了，然而科学仍落后得像小学生一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并不是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努力不够，更不是我们的智力比不上别人。基本的结症就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落后，和几十年来国内不能和平团结，以致不能产生一个全力从事科学建设的政府的缘故。

一个政府尽管它充满了要从事科学建设的愿望，甚至厘订了多少漂亮的计划，如果它不能使国家和平团结，它就必然没有办法达到它的愿望，和兑现它的计划。因为科学建设并不是轻易的事。尤其我国一切没有基础，要从头做起，更谈何容易。就以一个宜昌水闸来说，它就需要美金才能建成。如果我们继续内战，庞大的军费将是政府财政主要的开支，借来的外债也就只好用作购买外国的剩余军火，又怎能以全力来完成这些无比

* 本文发表于《科学与生活》1946年第1期。

艰难的科学建设呢？

同时，内战影响所及，使社会动荡不安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无辜牺牲。因此除了国营的科学建设不能进行外，民营的科学建设也绝无希望发展。

我们站在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热爱祖国的立场上，不能不在这里提出一个迫切的呼吁：

立即停止内战！

同时，我们希望在和平团结的局面下，能够产生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，用全部的力量，来进行和领导全国的科学建设。

八卦与新行星*

前不久我们在报上看到中央社一条惊人的消息，说是发现了新行星的刘子华博士回国了。同时又看到张道藩先生在各报上发表的《新行星发现者刘子华印象记》，使我们这些平常对科学不无兴趣的人大为惊喜，同时也大为惊异。虽说抗战期中，国外科学发展的消息不易得到，像这样一件可列入世界大事记的新闻，怎么会毫无所闻呢？因此我们也不免要和张道藩先生同感而怀疑：“会不会是骗人的？”

张道藩先生在他的印象记里写道：“……见面以后，觉得他是一个诚笃的学者，我的怀疑已去了大半……”我们，却没有这么大的勇气，虽然，一字不遗地读了张先生的介绍文字，仍然不敢相信，因为科学这种东西是一加一等于二，即使你再诚笃一点，也没有办法等于三，从介绍文里我们知道，这位刘子华先生所发现的新行星，是由八卦“原理”推证出来的，他把这行星命名为木王星，他的论文题是《八卦宇宙律与近代天文》。他原来是学过工业经济、政治经济……的，参加学生论文竞赛得过奖，后来有人请他讲易经，因为讲解的关系发生了研究兴趣，于是由“坤合地”“联想”到五行星，七配八合，把太阳、月亮都拉上当作行星，就推测出“木王星”了。

看到这里我们真不禁惊异到目瞪口呆了。且不论八卦也好，九卦也好；推论也好，联想也好，到底木王星存在不存在呢？如果真存在，那么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奇迹——我国古老的易经居然是部天书，而且证明古人到底比今人进步，我们的教育部也可以早颁明令，叫全国学校恢复读经了。或许在其他经书里，还可以发现新原子弹也说不定。可是在介绍文

* 本文发表于《科学与生活》1946年第1期。

内，我们所看到的证明，只是几位洋教授的“赞扬文字”。甚至这些赞扬也只限于“此论文为一种极奇异之试验”，“确是一篇重要著作”，“我还赏识他那种坚忍的工作精神和他慧敏的直觉观念……”

复古的东西本来是和洋教授很对立的，但是当洋教授的“赞扬”有助于复古的时候，又可能被请来做见证了。可惜我们在这些“赞扬”中却找不出半句是承认发现新行星这一事实。于是不得不耐着性子，等到11月3日晚上，再到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去静听刘子华先生本人的演讲。题目是《我怎样发现一颗新行星》。从这个题目看来，这颗新行星的发现显然已有证明了的，使我们不免又惊喜了。

忍耐着听了刘先生的“乾”呀，“坤”呀，“父子”“配偶”呀……一大套，还得到了四页讲义，却把我们更搞糊涂了，太阳是恒星，月球是卫星，这是我们的常识，可是刘先生已把它们归并为行星之列去。我们想这种归并，整个宇宙的万有引力关系势必全被推翻，那么中国的刘子华岂不打倒了牛顿、爱因斯坦了吗？这也就难怪他之被当局的器重了。

站在我们“常识”的立场上，对刘子华先生理论发生的疑问，简直多如牛毛，当场问他，他又“之乎者也”一番，据说留学多年，中国话已不大会说，只能说国“文”了。好吧，理论撇开不讲吧，唯一的无可争辩的是这颗行星到底存在不存在？如果刘先生的“理论”能成为理论，当然，已算出它的位置，那么天文台可以很容易找到它的，关于这一点，据刘先生表示，已经通知世界各天文台了，下文呢？我们且等着听好消息吧！

但是在这好消息还无从证明的时候，我们却有权利不承认这是科学的理论！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一种玄学的奇想。

科学是完全根据现实的东西，是不可能讲人情、讲面子的。如果要在科学上头吹吹打打，那是自己开自己的玩笑，除了出丑之外，不会有什么意外成功的机会的。